

西方汉学家的 中国文学观研究

—— 一次后殖民理论分析实践

胡森森 著

光明日报出版社

西方汉学家的 中国文学观研究

——一次后殖民理论分析实践

胡森森 著

光明日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西方汉学家的中国文学观研究：一次后殖民理论分析实践 / 胡森森著. -- 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15. 4

ISBN 978 - 7 - 5112 - 8185 - 2

I. ①西… II. ①胡… III. ①中国文学—文学研究—西方国家 IV. ①I2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067521 号

西方汉学家的中国文学观研究——一次后殖民理论分析实践

著 者：胡森森

责任编辑：朱 宁

责任校对：傅泉泽

封面设计：文人雅士

责任印制：曹 净

出版发行：光明日报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东城区珠市口东大街 5 号，100062

电 话：010 - 67078232（咨询），670788870（发行），67019571（邮购）

传 真：010 - 67078227，67078255

网 址：<http://book.gmw.cn>

E - mail：gmcbs@gmw.cn zhuning@gmw.cn

法律顾问：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龚柳方律师

印 刷：北京京华虎彩印刷有限公司

装 订：北京京华虎彩印刷有限公司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开 本：700 × 1000 1/16

字 数：320 千字

印 张：21.5

版 次：2015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2015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 - 7 - 5112 - 8185 - 2

定 价：65.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序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王岳川

十几年前，我提出发现东方、文化输出的文化理论构想。这一理论的核心关注就是中国身份、中国形象、中国立场的合法性问题：在全球化时代谁来说中国、代表中国。由于几百年间西方汉学在海外中国文化传播和文化形象建构中的巨大影响，成为探讨这一学术问题时无可回避的入思起点，反躬自省的一面镜像。

近十几年来，我在美国、英国、非洲一些国家、日本、韩国、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尼等国巡回讲演和教学，接触过很多汉学家，感受到中国文化无所不在的影响，而东亚文明圈对古老中国典籍、制度、礼仪的乡愁眷恋，与其对现实中国的猜忌芥蒂形成了鲜明对比。我曾在浩如烟海的国家图书馆文库中搜寻晚清以降中国文化向外输出的踪迹，却惊异于中西方文化交流的巨大赤字。我注意到，自沙勿略、利玛窦等传教士开启了入华的先河以来，除辜鸿铭、钱钟书、程抱一 etc 少数华裔人士外，更多译介中国文化及哲学入西方的使命，恰恰是由一代又一代西方汉学家所承担的，以耶解儒的文化对话，路易十四的数学家穿梭行走于康熙的宫廷，耶稣会士对于伏尔泰、莱布尼茨的深刻影响，启蒙时代前后西方的“中国热”……中国文化的最早输出不是主动而是被动，中西文化交流的先行者汉学家往返于东海西海，开启了西方了解中国的语言、风俗、文学、思想的大门，在学术史上留下了众说纷纭的争议与公案。

当然，在 20 世纪后期兴起的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新历史主义等后学理论看来，以异域旅行者身份传入某种文明的行为，是一种文化学意义上



的侵略与奴役。西方学者代表他们认为无法“自我代表”的文明对象发声的行为，隐含了物我两分的现代主义思维、线性历史观和西方优越论，知识叙事将第三世界边缘化、野蛮化、物质化，成为安静待在角落供西方人窥视的异域景观。后殖民主义批评大师萨义德批判以近东阿拉伯地区为研究对象的东方学家，他们貌似客观中立的学说著作中，隐含着浓重的西方中心主义情结，从而成为西方入侵东方的文化先遣队。

在译介并研究后殖民理论的过程中，一种疑问始终徘徊在我的心头：远东的东方学——汉学的真实历史面目又当如何？在游记汉学、传教士汉学、现代汉学等阶段，无论是终其一生未能如愿入华的沙勿略，不远万里来华奔走传教的利玛窦，为坚持正确的天文历法而锒铛入狱的汤若望，还是伯希和、戴密微、葛兰言，经由中国重新发现西方的于连，由于中国情结而遭受迫害的费正清及其弟子，包括我近年往返欧美邂逅的西方汉学教授……我实在无法将殖民主义或文化帝国主义同这些鲜活的形象联系在一起。但是，后殖民主义包括新历史主义提出的问题又分明真切横亘在那里，如果细读汉学家著作中某些章句与段落，也确实会发现一些文化偏见、套话甚至文化政治学端倪。看来，“主义”与“问题”之间生成了某种断裂，而这恰恰是入思的契机，只有解释这种断裂，才能真正还原出汉学作为一种历史叙事的当代价值意义。

在我看来，对汉学的重新评价与对后殖民批评理论的再次审视，其实是一个精彩的复调故事开端。“历史实体”与“批评方法”互为镜像，在对方眼中看到自己，继而自我修正。这是一种新的主体间性批评—理论互动模式，有助于摆脱为单一文化寻找神圣开端的惯性冲动和为某一理论寻求恒定真理性的陈旧逻辑。对于文学批评而言，后殖民视域下的西方汉学研究，隐含着很多有待开掘的学科史和方法论意义。

胡森森博士的著作《西方汉学家的中国文学观研究：一次后殖民理论分析实践》就是这样一种突破传统文论研究模式的尝试。该书在其博士学位论文基础上修改完成。作者尝试将中国文学的形象问题置于中西文化交流的历史背景之下，从西方人视野下中国文学形象的谱系入手，系统考察作为中国文学形象西传的中介——西方汉学家对于中国文学的认知与描述，审视全球



化时代中国文学的自我定位与形象输出问题。作者对西方汉学史上涉及中国文学观的学术史材料掌握充分，对于同中国文学形象相关的哲学、美学、文艺批评和比较文学等领域的理论资源应用准确，所使用的材料、数据真实可信，具有较强的前沿意义和实践价值，显示出一定学术眼光和理论勇气。

在我看来，本书最大的创新之处在于将后殖民批评方法引入汉学研究，对汉学家误读和悟读中国文学的理路进行考量与思辨，厘清后殖民批评与当代中国汉学研究沟通互动的可能性问题，系统而深入地讨论了中国文学走出汉学论述框架而自我表述和输出的未来前景，从而开启了中国文学形象与价值研究的新问题域。作者史论结合，采用层层追问的方式组织结构和逻辑论证，深入18世纪以降的西方汉学史，从多个角度和层面详细讨论了汉学家中国文学观的生成谱系、学科范式及其现实影响，按照时代顺序深入分析了从欧陆到美国的汉学转型及其对中国文学形象的介绍描述，概括总结了若干桎梏汉学家真正理解中国文学的套话和偏见，最后将落脚点放在还原中国文学真相从而对世界文学与文化有所贡献的问题上，显示出较强的文化关怀意识和学理省思意识。

当然，本书也存在若干不足之处，特别是对于汉学家接触中国文学的历史细节还可进一步梳理，对汉学家中国文学观的未来前景还可进一步阐释和说明。

我十分同意作者结语提出“中西互动，走出汉学”。汉学的背后是西方现代性以来知识与权力的同谋，导致对于某种文化的价值判断过于依赖判断者的眼光与需求，甚至严重脱离文化本身的历史与现实而成为某种封闭自足的话语体系，这是现代学科发展的共同弊端。汉学只是必须被超越的原点，研究西方汉学家的目的，不是为了对汉学家进行道德审判，而是为了自我言说、自我输出中国文化。今天，人类文明早已走出中西之争的洪荒岁月而进入古今之争的太空时代，决定文明间竞争结果的不是器物而是思想，不是空间而是时间，不是财富而是文化。中国的文化形象不能依靠善良的西方汉学家塑造传播，这一点我在十几年前的《中国镜像》《发现东方》等书中已经清楚地表达过立场。正如鲁迅所说“首在审己，亦必知人，比较既周，爰生自觉”。文化比较的意义在于文化自信，对话的未来就是言说，中国文化已经开



始了走出去的步伐，正在迈向浩瀚无边的东西方大洋彼岸。中国文化的美丽精神，在经历欧风美雨的洗练后正在焕发出新的活力，而追求和睦、和谐、和平的“三和文明”，必将成为对现代以来西方竞争、斗争、战争的“三争文明”的超越，引导人类共同进入理性、宽容、温情、敬意的光荣时代，让“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理性宽容成为人类文明对话的常识，让“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的太古遗音奏响新世纪乐章的序曲。这大概就是五四以降一代代中国学人心目中“中国文艺复兴之梦”的真谛吧。

我与胡森森博士的师生情谊，可以从2000年他选修我的《文艺美学》课程算起，直至一路考取我的硕士生、博士生，屈指一算已有14个年头。他的本科毕业论文是研究全球化时代的后殖民理论，硕士论文是以文艺美学的时空体验视角研究西方社会学思想，博士论文是他11年燕园问学生涯的总结，他在同我多次讨论后，选择从后殖民视角进入学科史研究，梳理西方汉学家对中国文学和文化的认识流变，折射现代以来几百年间中国文学与文化的海外形象。作为老北大，他善于钻研、勤于思考、严谨治学，对中西文学交流史、中外文艺理论、比较文学等领域有过细致梳理和独立思考，在校期间有多篇科研成果发表于学术期刊，并有专著和译著出版，包括同我合著出版的《文化战略》一书，还担任过《北京大学研究生学志》的主编。这些年来我提出发现东方与文化输出，他奔波践履，承担了不少学术助手的任务。如今看到他博士论文书稿杀青，备感欣慰。值得一提的是，胡森森博士毕业后考入中央机关工作，未如众师友所望留在高校继续学术研究，这无论对于他本人的治学理想还是对继续深入研究这一问题而言，都是一点小小遗憾。不过正如美国诗人弗罗斯特所说“我们永远是站在三叉路口选一条路走，不可能走回头路，不可能回到原点。既然不可能回到原点，那就不存在后悔的事。差别只是每条路的风景都不一样”。新的环境使他更加成熟，对许多政治和社会问题的观察思考更多一份冷静与沉着，对于中国政治问题亦常有文章见诸报端。我想，世上没有绝对的遗憾，对于未来的中国政治生态而言，多一些这样有作为的年轻人也是好事。

衷心祝贺胡森森博士的论文付梓出版。我非常欣赏他在书中所引用萨义



德的话“批评必须把自己设想成为为了提升生命，本质上反对一切形式的暴政、宰制、虐待，批评的社会目标是为了促进人类自由而产生的非强制性的知识”。希望他未来的事业人生一切顺利，永远保有北大赋予他的独立、理性、宽容、担当精神，让学问成为一生的气质。

是为序。

2014 年深秋于北京大学



CONTENTS

目 录

序 王岳川 / 1

绪 论 / 1

问题缘起：汉学能否成为文化批评的研究对象 / 1

本书所涉及的“西方汉学家的中国文学观” / 3

相关学术史描述 / 9

一、当代汉学研究界对汉学家的中国文学观问题的认识 / 10

二、国内文学研究界对汉学家的中国文学观问题的认识 / 14

方法论说明 / 21

一、后殖民批评理论 / 21

二、比较文学形象学理论 / 23

三、文化地理学理论 / 26

第一章 西方汉学家的中国文学观如何发生 / 28

第一节 汉学家的中国文学观能否突破西方文学批评观念 / 28

一、如何理解“文学批评”这一关键词 / 28

二、“西方汉学家的中国文学观”的特殊指涉 / 30

第二节 中国文学西传过程中的选择问题 / 32

一、游记汉学时代：缺席的中国文学 / 33

二、中国文学译介之发生 / 35



三、传教汉学时代对中国文学的回避 / 37

第三节 中国文学缺席下的 18 世纪“中国热” / 44

一、戏剧风靡而文学缺失 / 45

二、文学缺失背景下的“中国园林热” / 51

第四节 汉学家的文学观造成“中国热”退潮 / 60

一、中国形象变更的根源在西方 / 61

二、启蒙时代的主体性凸显与现代性伦理 / 63

三、中国文化形象跌落：一次现代性事件 / 64

四、中国热退潮后的专业汉学诞生语境 / 66

第二章 西欧汉学家的中国文学观范式问题 / 70

第一节 法国汉学界的中国文学观范式谱系 / 71

一、法国汉学的师承体系考辨 / 72

二、追根溯源：索隐派情结与汉语形象 / 78

三、语言中心主义的文化政治学反思 / 84

四、民俗学视角：文学是了解中国人生活的窗口 / 88

第二节 英国汉学家翻译背后的文学观问题 / 97

一、中国文学进入英国人的视野 / 97

二、英国汉学学科建制特色 / 100

三、英国汉学家笔下的中国文学形象 / 102

第三节 德国汉学的中介意义 / 105

一、德国汉学分期问题 / 106

二、中德学界对话史的启示 / 107

三、德国汉学移美与美国汉学起源 / 109

第三章 美国汉学家的中国文学观范式问题 / 112

第一节 美国汉学家的中国文学观溯源 / 112

一、博物学视野下的“观察中国” / 113

二、中国语言文字论 / 115

三、文学故事化的《诗经》解释模式 / 116



四、从雅文学指向“文明的停滞”	/ 119
第二节 “中国研究”学派对于中国文学材料的使用	/ 122
一、“社会-文学”与“西方冲击-中国回应”	/ 123
二、“中国研究”学派文学观的内在一致性	/ 128
三、经由中国文艺阐释儒教命运	/ 130
第三节 汉学家个人化诗歌解读的意义与局限	/ 137
一、文体：形式的优越感	/ 139
二、后现代语境下的文本细读	/ 142
三、传记式写作的故事化倾向	/ 146
第四节 从阐释焦虑到理论自信	/ 150
一、美国汉学的社会科学特征	/ 151
二、“社会科学化”的文学研究	/ 152
三、中西文学理论话语权问题	/ 157
 第四章 当代西方汉学家中国文学观新趋势	/ 159
第一节 范式突破：彰显“异”的价值	/ 159
一、经由中国反思“世界文学”	/ 160
二、经由中国的思想与艺术之旅	/ 164
第二节 范式突破与谱系延续	/ 172
一、“以中国为中心”仍属内部调整	/ 172
二、中国研究的后现代转向及其争议	/ 174
三、生态学叙说与全球史视野	/ 178
四、后殖民汉学家及其学术实践	/ 180
第三节 挖掘中国文学的内在解构性	/ 186
一、解构主义视野下的“中国文本”与“文本中国”	/ 187
二、设身处地性与重建少数派话语	/ 193
第四节 族裔散居：异军突起的华裔汉学家	/ 201
一、远游的诗神	/ 203
二、置身于生态美学边缘	/ 205



第五章 西方汉学家的中国文学观的套话分析 / 210

第一节 形象学意义上的套话 / 211

第二节 汉学家的中国文学观的套话举隅 / 214

套话一：以我观物 - 以西解中的思维痼疾 / 215

套话二：地理学与人种学视角 / 220

套话三：以西方理论统摄中国文学 / 229

套话四：中国文学今不如古 / 240

汉学批评中的套话问题——以欧美红学为例 / 254

第三节 能否走出殖民主义文化观的误区？ / 259

第六章 西方汉学家的中国文学观价值定位 / 264

第一节 争议：是否存在东方主义或汉学主义？ / 265

一、汉学与东方学的比较分析 / 266

二、汉学家“发现中国”的着眼点与认知逻辑 / 269

三、汉学个案对后殖民经典阐释框架的挑战 / 273

第二节 汉学家的中国文学观的本土处境 / 282

一、启发西方文学与思想的灵感之源 / 283

二、关于文学想象与汉学渊源的个案分析 / 290

三、孤独言说：大众文化时代的汉学处境 / 298

结语：中西互动 走出汉学 / 302

一、后殖民理论与汉学研究互动的学科意义 / 303

二、批评不再是特权：艺术终结时代的批评反思 / 306

三、走向文化研究的空间差异性视角 / 308

四、回归中国文化自身价值诉求 / 310

参考文献 / 314

后 记 / 328



绪 论

没有对批评的批评就没有批评。

——蒂博代《六说文学批评》

问题缘起：汉学能否成为文化批评的研究对象

作为特殊的学术群体，西方汉学家关于中国文学的观点和论述构成了近代以来中西学术交流史上的一道独特风景，对中国文学的海外形象建构与传播发挥过建设性作用，同时也表征出一些问题。在全球化时代，中西方文学研究界对话的机会日益增多，“汉学家的中国文学观”也对国内的文学研究产生了方方面面的影响。中国学术界究竟应该如何评价汉学家们对中国文学的认识？如何判断西方汉学体制下生成的关于中国文学整体形象的学科话语的历史、特征及价值？

在寻求一种有效的文化批评维度切入汉学家的中国文学观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要触及萨义德（Edward Waefie Said, 1935 - 2003）的《东方学》（*Orientalism*）与后殖民批评问题。对文艺理论学科而言，其真正贡献并不限于对西方殖民主义的批判和为东方“正名”，还包括方法论层面——解读“东方学”这门西方学科史的谱系学视角。在《东方学》中，萨义德将“东方学”这门西方学科概括为通过建构东方这一“他者”而构筑起来的知识谱系，这对于重新认识西方关于东方的知识系统有着重要意义。^① 借助福柯话语分析

① 萨义德指出了“东方主义”（*Orientalism*）的三重含义：“第一，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将他们（注：这里的‘他们’指西方人）的学术谱系呈现在他们面前；第二，对他们的著作大多依赖的、常常是未受质疑的那些假定提出批评，希望引起进一步的讨论。……所有这些问题都不仅与西方关于他者的概念和对他的处理有关，而且与西方文化在维柯所说的民族大家庭中所起的极为重要的作用有关。最后，对所谓‘第三世界’的读者而言，这一研究……是理解西方文化话语力量的一个途径，……显示文化霸权所具有的令人生畏的结构，以及特别是对前殖民地民族而言，将这一结构运用在他们或其他民族身上的危险和诱惑。”[美] 爱德华·W. 萨义德《东方学》，王宇根译，三联书店2007年版，第32-33页。



策略和葛兰西文化霸权理论，萨义德对“东方学”背后隐藏的西方－东方权力话语进行了精彩的剖析。^①不过，萨义德意指的“东方学”显然指的是关于阿拉伯或近东地区知识的学科，对于远东和中国问题涉及不多，这就留下疑问：后殖民主义的分析策略能否应用于汉学？汉学与东方学之间，在历史背景、学科建制、谱系、观念和历史影响等方面有着怎样的异同？汉学是否参与了发现、描述和建构中国形象的过程，对于今天的中国形象有着怎样的历史影响？汉学在多大程度上能对萨义德的《东方学》以及后殖民理论提出反驳？

后殖民批评本质上属于西方批评理论，西方汉学亦属于西学，两者对于中国而言都有相关性（或“平行”或“影响”的关系），两者各自的专业研究今天已经屡见不鲜。自《东方学》批判了“东方学”这门西方学科与殖民主义的历史联系后，“东方学”与“汉学”的比较研究似应纳入学术界的考察范围，然而时至今日深涉这一领域者不多。当前中国学术界反而对于西方汉学有盲目推崇的倾向，使得海外汉学成为后殖民等文化政治理论无法触及的“禁区”。这种“禁区”存在问题，能够也必须进入。

我坚持：后殖民理论可以用来分析西方汉学，后殖民理论有必要进入中国学术界的应用实践中，同中国－远东的“东方学”——汉学进行正面碰撞和对话。本书希望以“后殖民主义”为主要方法，以“西方汉学家的中国文学观”为研究对象，以“中国文学形象”为线索，沟通“批评理论”与“汉学学术”两端，进入“西方汉学”的学科生成谱系，通过后殖民理论分析实践，探讨“中国文学形象”的建构过程与“西方汉学家的中国文学观”自身生成谱系之间的历史关联。本书认为：汉学家解释中国文学与文化的过程往往是建构他者和对象的过程，从而将中国置于“被描述”“被建构”的客体地位，在全球化的今天，东方真正被“发现”，中国文学真正“走出去”，必须张扬自身文化主体性并自我表述，而不能一味依赖西方汉学家的中国文学观。

^① 萨义德本人在《东方学》绪论中解释过自己的批判逻辑与福柯的相似性：“我发现，米歇尔·福柯在其《知识考古学》和《规训与惩罚》中所描述的话语观念对我们确认东方学的身份很有用。我的意思是，如果不将东方学作为一种话语来考察的话，我们就不可能很好地理解这一具有庞大体系的学科，而在后启蒙时期，欧洲文化正是通过这一学科以政治的、社会学的、军事的、意识形态的、科学的以及想象的方式来处理——甚至创造——东方的。”《东方学》，绪论第4-5页。



本书所涉及的“西方汉学家的中国文学观”

本书关注的焦点是中国文学的域外形象，而研究领域则设定为西方汉学家的中国文学观——即西方汉学家对于中国文学的相关印象、观念及学术论述，视其为中国文学域外形象的典型代表，考察其与中国形象、文学形象、文学作品之间的关系，分析汉学著作本身的文学性与想象性，论述汉学、文学与地理学之间的复杂关系，提出后殖民主义等文化批评理论应用于国内汉学研究的可能性。

“汉学”这一概念在当前国内外学术界可谓言人人殊，就字面意义而言，最通用的是两类涵义：其一，指的是“汉代之学”或“汉代学风”，如刘师培在《近代汉学变迁论》中所言“古无汉学之名，汉学之名，始于近代。或以笃信好古，该汉学之范围”，这种学风代表中国古代学术中（尤其是清代学术）与重视义理的“宋学”相对的重视考证之学，此部分涵义属于“国学”范围内，与本文关系不大；其二，是从外文翻译过来的 Sinology（英文）或 Sinologie（法文），指的是国外对于中国历史文化研究的总称，是“外国人”研究中国的一门学问，包括欧美、日本、朝鲜等国家的“中国学”，根据不同的时代、区域与国家，又可以限定为欧美汉学、海外汉学、日本汉学、近代汉学、当代汉学、传教士汉学、专业汉学等等，二战之后在欧美学术界也产生了以“中国学”取代“汉学”概念的提法。^①

从地理位置来看，中国同周边国家如日本、朝鲜的文化交流开始较早，据韩国哲学会编《韩国哲学史》称，中国文化至少在朝鲜三国时代（公元1世纪-7世纪）已经正式被接纳并保留下来，儒学思想更是随着公元372年高句丽建立太学，开设五经等中国典籍课程而进入了朝鲜半岛，从此对朝鲜产生了至深至远的影响，涌现出崔致远、李奎报、李齐贤、申纬等中国诗文的实践者和鼓吹者；经由朝鲜的中介（公元4世纪末到5世纪初，百济博士王仁携带《论语》十卷等东渡日本传播儒学），日本文化虽然受中国影响很大，但进行的有意识选择和改造更多，例如将“天人感应”与“日本神道”结

^① 此外，汉学也有与“蕃学”相对的意思，代表了中国境内少数民族对汉文化的称呼。北宋时期，党项族李元昊（1003-1048）建立西夏国后，曾致力于借学习汉文化发展西夏文化，当时西夏朝廷设立了蕃学和汉学，分别选蕃汉子弟入学，科举取士，翻译汉文经典。但这种说法并不常用。



合,将“忠君”置于“孝悌”之上等等。^① 本书考察对象的空间范围严格界定为“西方汉学”,基本不涉及亚洲范围内的“中国学”。

在西方汉学研究范围内,关于汉学何时形成,何时成熟和变化等历史分期问题悬而未决。据国内汉学研究先驱莫东寅在《汉学发达史》中的分类,可以分为7阶段:1-7世纪秦汉六朝时代欧人关于中国之知识;7-12世纪唐宋时代阿拉伯人关于中国之知识;13世纪蒙古勃兴西人关于中国之知识;14-15世纪元代到明初西人关于中国之知识;16-17世纪明代到清初欧西之中国研究;18世纪即清代中叶欧西之中国研究;19-20世纪鸦片战争之后汉学的发达。^② 然而这种分类法显得不够鲜明,略显烦琐和陈旧。忻剑飞在《世界的中国观——近二千年来世界对中国的认识史纲》中将西方对中国的认识分为5时期。阎纯德在《汉学和西方汉学研究》一文(载《汉学研究》第一辑)中分为5大时期,突出了20世纪中叶以后的当代汉学。李学勤认为“16世纪中叶汉学真正诞生”^③,而这一时期正是利玛窦来华带来的传教士汉学兴盛期;吴孟雪、曾丽雅的《明代欧洲汉学史》采用了李学勤的看法,明确提出“欧洲汉学缘起于明中后期,即16世纪至17世纪中叶这百年间。当欧洲人走近中国,对大明王朝进行近距离、全方位、多层次的观察后,欧洲汉学便在不知不觉间问世了”。^④ 总体上看当代学术界基本沿用的是三分法,将西方汉学分为游记汉学时期、传教士汉学时期以及专业汉学时期。

同东方学类似,^⑤ 欧美不同国家内部的“汉学”其实也绝非千人一面,对于中国的兴趣亦各有侧重。传统意义上的西方汉学包括像法国、德国、英国这样的西欧国家,多与东欧无关,尽管按照德国在地图上属于中欧,然而按照历史家的研究习惯(不可否认这种划分有种族主义色彩),德国属于文化意义上的“西欧”,而出于地缘政治因素,俄罗斯包括东欧斯拉夫国家的中

① 参见何寅、许光华主编《国外汉学史》,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3-8页。

② 莫东寅此书的章节目录清晰地表明了这一点,参见莫东寅《汉学发达史》,郑州:大象出版社2006年版。

③ 李学勤:《国际汉学著作提要·序》,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

④ 吴孟雪、曾丽雅《明代欧洲汉学史》,北京:东方出版社2000年版,前言第1页。

⑤ 萨义德曾经指出:由于对东方的“政治上的控制权”不同,英国较为偏重实证性而法国较为偏重想象性,“也许,人们一向感觉到的现代英国东方学与现代法国东方学之间所存在的差异归根到底是一种风格上的差异”,而在这两大传统中,共性在于“对东方和东方人进行归纳和概括的重要性,对长期存在于东西方之间的差异的感觉,对西方统治东方的快意认同”。二战之后,美国取代了英法的中心地位,传统东方学在美国也发生了一些变异,例如大众形象的泛滥,对社会科学方法的重视,与文化关系政策相结合,将一切罪恶归结为伊斯兰和东方等等。参见《东方学》,第287页,第364-413页。

国研究往往不被算作“西欧汉学”范围；另一方面，西欧的范围也包括葡萄牙、西班牙、意大利和荷兰等，然而“就西欧各国对中国文化的反应，或中国文化对西欧各国的影响程度而言，最热烈、最具典型意义的，无疑是上述的三个国家（英、法、德）”。^①

18世纪西欧各国对中国关注点不同，也因为自身所处的历史发展阶段差异导致其与中国的相似性有强弱之分^②。亚当·斯密（Adam Smith, 1723 - 1790）对于工程建设的研究表明：法国对中国文化的仰慕多源于“政治”和“经济”上的相似性^③，所以最为热衷，汉学成就也最高。英国则态度较为冷淡。范存忠先生指出过18世纪英国知识界对中国的态度：“英国的汉学，同欧洲其他国家比较起来，进展较慢。在18世纪的后期，欧洲大陆已经有几个像样的汉学家，但在英国，除了琼斯还找不到第二个人。琼斯是英国第一个研究过汉学的人”，但是琼斯“在东方学方面的主要成就，是在阿拉伯、波斯、印度等几个方面，而不在中国。”^④英国研究中国的目的重在开拓中国市场，也借鉴文官制度。德国或普鲁士与中国的相似性更弱，加上知识分子的政治软弱和冷漠，多热衷于精神文化、语言、哲学和文学艺术领域，从莱布尼茨身上就可见一斑。

1840年之后直到二战前夕，欧洲尤其是法国依然是西方汉学的中心。1840 - 1876年间英国人和法国人对于中国都很感兴趣，英国当时关于中国问题的文章更多，但范围太广，且经济贸易领域占据了很多；相反，“由于巴黎城本身的条件及其拥有的中国典籍，它成了欧洲汉学研究的中心。加之法国

① 《十八世纪中国文化在西欧的传播及其反应》，杭州：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02年版，第913页。

② 正如严建强所言：走出封建时代的法国是一个政治上以专制主义中央集权为特色、经济上以租佃农业为基础的社会，这个社会与当时的中国具有某种相似性，但又没有达到成熟的程度。正是这种既相似又有差别的状况，导致了法国社会对中国文化的仰慕和热情，也导致了法国社会对中国文化的多方面的利用；18世纪的英国已经开始走出传统的农业社会，所以像法国那样在政治上学习中国的开明君主，在经济上学习中国重视农业的现象并没有在英国出现。处于贸易扩张时代的英国有意识地将对中国的了解和研究与寻求更广大的市场联系起来。然而作为一个近代国家，英国在行政官员的选拔方面还保留着传统的方式，与中国历史悠久的文官考试制度相比显得落后，所以在这方面它像其他欧洲国家一样学习中国的经验；18世纪的德国依然处于封建分裂的状况……市民阶级与知识分子对政治表现出极度的淡漠，却热衷于在精神文化领域耕耘收获，由此造成了德国……表现出一种独特的文化价值取向。《十八世纪中国文化在西欧的传播及其反应》，第9-10页。

③ [英] 亚当·斯密著《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郭大力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4年版。

④ 范存忠《中国文化在启蒙时期的英国》，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201 - 202页。